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研究新进展

黄泰岩^{1 2}, 王 琨²

(1. 中央民族大学 校长办公室 北京 100081; 2.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6)

摘要: 2016 年是学界探索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关键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学者们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益的成果。本文对学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和方法这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归纳,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17)10-023-08

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我们从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公布的 2017~2018 年 CSSCI 来源期刊经济学类排名前 20 名的杂志中,依据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下二级学科平衡分布的需要,选择了 15 本统计样本期刊。为保证覆盖面和代表性,又选择了刊有经济学类文章的其他 4 大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和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类)各自排名第一的期刊,构成了共 19 本统计样本期刊。基于这 19 本期刊 2016 年发表的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我们就这一专题进行综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并用于指导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学的时代使命。2016 年学界在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一) 经济发展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经济改革、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出发,根据国内国际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趋势、新变化,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和内涵。对此,学界进行了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 2017-09-16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5JGA018)

作者简介: 黄泰岩(1957-),男,山东招远人,经济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王琨(1987-),男,山东济南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郭克莎认为,判断和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或新阶段,是对实践过程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也是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探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看,判断和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或新阶段的理论依据:一是从适应生产力发展阶段看,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已进入后期阶段,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增长动力将发生较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一致的;二是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看,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长期高增长并进入较高收入阶段后,都出现了以增长速度大幅回落为特征的重大转变,潜在增长率、增长因素、增长机制等都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其历史经验为新常态提供了佐证材料;三是从推进经济发展取向看,提出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也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新常态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将被实践证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作用。^[1]

在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基础上,学者们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逢锦聚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虽然结构性需求不足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在生产领域,生产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不足,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畅,要素生产率较低等,这实际是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的阶段性特征。所以,认识引领新常态,保持国民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要牢牢把握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创新驱动,创造新供给;要妥善处理质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中高速增长;把深化改革和惠民生紧密结合起来。^[2]

(二) 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改革、建设、发展的重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的新成果。

1. 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顾海良认为,新发展理念在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新的回答中,凸显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蕴。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当代运用和丰富,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与现实应用。^[3]

2. 新发展理念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深化和拓展

吴宣恭认为,新发展理念集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条件、发展维度、发展路径、发展目标于一体,全面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涵的深化拓宽和高度概括,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具体来说,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首要推动力,是从生产方面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涵的高度提炼;协调反映了深化协调发展规律的要求,既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绿色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规律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结合,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天人关系”上的延伸和深化;开放是社会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涵在国际范围的拓展;共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体现的社会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4]

3. 新发展理念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灵魂

逢锦聚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内涵的丰富和提升,也是指导“十三五”乃至整个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灵魂。^[2]顾海良认为,新发展理念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

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贡献。^[3]易森等认为,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指导意义,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改革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拓展。^[5]

4.新发展理念是“术语的革命”

顾海良认为,新发展理念具有显著的总体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由此而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发展实践的理论和学说的提炼和总结,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6]

黄泰岩也指出,理念决定理论的观念体系和结构框架,新发展理念为形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理论、新体系、新话语开辟了道路。^[7]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重大理论突破,其精髓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可以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发挥二者的优势,并生成新的制度、体制优势。^[8]虽然学界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9]然而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比如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与公有制结合、能否结合、怎样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何相容等。^[10]为此,学者们围绕这些难题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主要进展有:

1. 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张宇认为,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复杂结构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属性,这就决定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既有内在一致性和兼容性,又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具体表现在产权结构的直接社会性与局部性、计划与市场、等量劳动互换与等价交换、劳动力的主人地位与商品属性、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等方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使二者的结合成为可能。^[9]

周新城认为,市场经济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必定有姓“资”姓“社”的区别。任何经济运行机制都是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运转的,不可能脱离所有制孤立地存在和运转。市场经济有社会制度属性,它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务,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1]

张宇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有着深刻的制度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总是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个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的共有的经济现象,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和属性。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存在,总是要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机制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市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很不相同。^[12]

简新华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角度说明了我国有必要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他们认为,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是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发展公有制经济;由于是初级阶段,还做不到由全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还不可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国民经济自觉地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而迄今为止的实践也证明市场经济比传统计划经济更

能有效配置资源。因此,我国现阶段自然需要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10]

2. 国有企业改革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核心

简新华等认为,公有制企业如何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是公有制能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核心问题。要改革国有经济原来的管理体制,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变国家所有国家直接经营的企业制度,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治理结构和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发挥企业职工主人翁的作用。^[10]

(四) 更高层次的开放理论

在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提出并创立了“开放型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裴长洪尝试提出了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纲要,认为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和国际分工理论,创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其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1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

2016年学者们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主线、体系结构、话语体系、方法论原则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界目前还存在不同观点。

1. 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而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刘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学说,生产关系运动规律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源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及其变化。^[14]白永秀也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不断延展“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运用范围,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制度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经济行为,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等。^[15]逢锦聚也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6]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

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这既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发展政策和发展道路。^[17]

3.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卫兴华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系统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技术层次的生产力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层次的生产力。^[18]黄泰岩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相对落后上的现实提出,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在仅仅联

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就不够了,应该将生产力也纳入研究对象,具体体现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19]洪银兴进一步提出,在发展变化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相互联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建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经济理论。^[20]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发展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比如,逢锦聚将其概括为发展经济,满足需要。^[16]张宇则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作为逻辑主线中,要更加突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容。^[17]黄泰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简要地归结为改革和发展两大主题,并认为进入新世纪后,改革与发展关系组合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强大动力纳入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19]

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顾海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探索为主体,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研究为主线。^[21]洪银兴则将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22]刘伟则将其确定为考察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14]丁霞则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确定为研究主线。^[23]白永秀则提出,相对于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研究主线的西方经济学而言,秉承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途径为研究主线。^[15]

对于这种分歧,周立群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基本的概念抽象,从而难以形成一个有内在逻辑的范畴体系以作为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基石。范畴体系和系统性构建的根本是理论创新,基础理论的创新是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24]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学者们虽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方面进行了很多思考,但是,学者们之间存在较大分歧,他们基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框架或内容。

黄泰岩基于发展的逻辑主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确定为包含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速度、发展转型、发展动力、发展道路、发展资源、发展环境、发展制度十大内容。^[19 25]

洪银兴则认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成功,包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领域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系统化成就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也强调该理论体系是动态的,新的实践和创新的理论会不断丰富这个理论体系。^[22]

逢锦聚提出,应当从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等四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16]

任保平则提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及其变迁、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中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中国与世界合作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五个层次构建基本框架。^[26]

刘伟则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核心命题、主要任务、根本目的四个方面概括了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14]

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丰富,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27]具体包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等。^[28]

白永秀等提出,政治经济学新的研究体系应当由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宏观经济、经济全球化等七大部分组成。^[15]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和方法

(一) 话语体系

1. 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大部分学者都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以开放的视野汲取和借鉴中外理论成果的科学成分^[24],但是,也同时强调“必须摆正中外本末主次关系,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奉为主流和圭臬”^[29],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和主体地位。^[30]

2. 用通用语言讲中国故事

黄泰岩认为,要把反映中国经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系统化为完整的经济学体系,用通用语言讲“中国故事”,而不是用中国语言讲“世界故事”。^[31]裴长洪认为,怎样处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更多地是需要多数人读懂基础上的提高再提高,这是应当倡导和努力的方向。^[13]

3. 将中国基因作为基本内核

周文认为,国弱无话语。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和能力,中国发展经验构成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核。^[32]逢锦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也才能逐渐为世界所重视、所接受。^[33]杨春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起在中华思想文库中挖掘优秀基因的工作,这是中国经济学人的时代课题。在挖掘这类思想基因时,要注意在动态过程中重建这些优秀思想基因,给它们提供一种科学的分析基础。^[34]

(二) 方法论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但对具体表现,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认识。

逢锦聚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又表现为矛盾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抽象法、人是历史主体的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实证方法、数学分析方法等。^[16]

蔡继明等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具体到八个方面:一是科学抽象法;二是矛盾分析法;三是中介分析法;四是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五是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六是经济运行的生理学与经济发展的病理学;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八是逻辑批判与逻辑一致性原则。^[35]

丁霞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总体方法论,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应用就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八大特征:一是总体方法论是构建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二是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对立统一;三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对立统一;四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五是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六是总体的逻辑起点选择原则和方法具有重

大的方法论意义;七是强调中介范畴在逻辑推进和运动过程中的重要性;八是逻辑主线的选择至关重要。这八大特征为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方法论基础。^[23]

林岗则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总结为四个分析规范:一是用生产关系必然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来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二是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分析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三是依据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四是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36]

四、总结与展望

2016年是学界积极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关键一年。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诸多问题,更搭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现有研究来看,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特别注意: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完善较多停留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层面,缺乏有深度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这就降低了理论的说理力和可信性。未来的研究应当在理论构建和经验验证上下功夫,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抽象出理论,再用经济发展的现实验证理论,继而实现理论的进一步修正,而不是停留在响应政策和提出号召的层面上。

第二,尽管学者们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很多是在各说各话,缺乏开放性、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能够容纳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挑战,我国需要的是开放、包容、动态的经济理论体系,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实现与世界各个经济学流派的对等交流,这就需要构建更为通用、平等的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 [1]郭克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J].北京:经济研究,2016(09):4-16.
- [2]逢锦聚.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原理及其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现实意义[J].成都:经济学家,2016(02):5-15.
- [3]顾海良.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J].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01):1-7.
- [4]吴宣恭.五大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涵的深化拓宽和高度概括[J].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08):63-71.
- [5]易森,任毅.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拓展[J].成都:财经科学,2016(04):50-57.
- [6]顾海良.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J].成都:经济学家,2016(03):5-7.
- [7]黄泰岩.新发展理念催生新发展理论[J].北京:中国经贸导刊,2016(15):39-40.
- [8]胡家勇.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J].北京:经济研究,2016(07):4-12.
- [9]张宇.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J].北京:经济研究,2016(06):4-16.
- [10]简新华,余江.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吗?——兼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J].北京:经济研究,2016(12):4-17.
- [11]周新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在市场经济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分歧[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16(07):33-48.
- [12]张宇.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J].北京:经济导刊,2016(12):56-67.

- [13] 裴长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04): 14-29.
- [14] 刘伟.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05): 4-13.
- [15] 白永秀, 吴丰华, 王泽润.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 现状与发展[J]. 北京: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08): 82-92.
- [16] 逢锦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J]. 北京: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05): 89-110.
- [17] 张宇.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N]. 北京: 人民日报, 2016-08-29.
- [18] 卫兴华. 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N]. 北京: 人民日报, 2016-12-21.
- [19] 黄泰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线和框架[J]. 北京: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6(05): 8-14.
- [20] 洪银兴. 以创新的经济理论阐释中国经济发展[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1): 28-35.
- [21] 顾海良. 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01): 4-11.
- [22] 洪银兴. 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04): 4-13.
- [23] 丁霞. 善于把握和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再研究[J]. 北京: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07): 55-64.
- [24] 周立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构建与创新[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03): 27-30.
- [25] 黄泰岩.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 北京: 光明日报, 2015-12-02.
- [26] 任保平. “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J]. 北京: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06): 12-18.
- [27] 张宇.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N]. 北京: 人民日报, 2016-02-23.
- [28] 张宇.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J].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02): 45-50.
- [29] 胡培兆. 政治经济学要进入社会[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03): 25-27.
- [30] 林岗.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 北京: 光明日报, 2015-12-02.
- [31] 黄泰岩.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J]. 北京: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01): 17-22.
- [32] 周文. 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03): 37-41.
- [33] 逢锦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10): 4-11.
- [34] 杨春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问题[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08): 4-16.
- [35] 蔡继明, 靳卫萍.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J].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02): 34-44.
- [36] 林岗.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坚持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03): 18-21.

责任编辑: 郑洪昌

The Growth Mechanism and Conditions for the Proposition of Prior Growth of Means of Produc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Formula According to Lenin's Classificat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
Tao Weiqun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igor and accurac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roposition of prior growth of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formula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Lenin's classificat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classical Marx's social reproduction formula and the general solution method and conditions are put forward. The growth mechanism under the proposition of prior growth of means of production is expounded and it is revealed that "product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means of production" has a guiding and leading role in social expansion of repro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uang Taiyan, Wang Kun

Abstract: It is a crucial year in 2016 for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explore the new real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lso stressed at the symposium 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o "construct the discipline,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s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related issue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d a series of beneficial resul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promoting Chinese Marxist economics,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ing the discourse and method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udy of the Drawbacks of Kornai's II B Model from the Macroeconomic Research Method of Das Kapital

He Ganqiang

Abstract: Marx is the pioneer of scientific macroeconomic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economic thought. Das Kapital follow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reveal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macroeconomic form and the decisive role of its ownership level in the state of macroeconomic mov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mainta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to make good macro-control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stress that "the marke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but even more necessary to stress that "social production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roduction and market circulation, particularly that the basis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such relationship. The revelation of macro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decisive factors by Das Kapita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recognize the drawbacks of Western economics. The II B goal model proposed by Kornai regarding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copies the neo-liberal economics mechanically; it completely puts aside the key position and role of public ownership in socialist macroeconomic control, is marked by bourgeois economics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and essentially adheres to the capitalist road, thus has great hazard.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 Path of Land Transfer Promoting the "Second Leap"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Cheng Enfu, Zhang Yang

Abstract: China has been promoting market-oriented land transfer in recent years. The current land transfer faces serious risk of privatiz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In order to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cooperative economy in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to review Deng Xiaoping'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guideline in his "second leap theory" regarding socialist rural and agricultural reform development, so as to actively prevent and correct the huge risk of privatization in land reform and ensure that land transfer develops along the road of socialist rural collectiviz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Based on the rural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in recent 40 years and the outlook on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as well as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such as substantive leap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agricultural re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new rural areas and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onditions put forward by Deng Xiaoping are already availabl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guideline of the "second leap", which definitely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the new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effective path for land transfer promoting the "second leap" is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the "second leap" and by combining the important speech spirit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uch as the thinking of "divided" and "unified", the thinking of "four bottom lines" and that of "weak collective economy in poor villages".